



回顧與展望

希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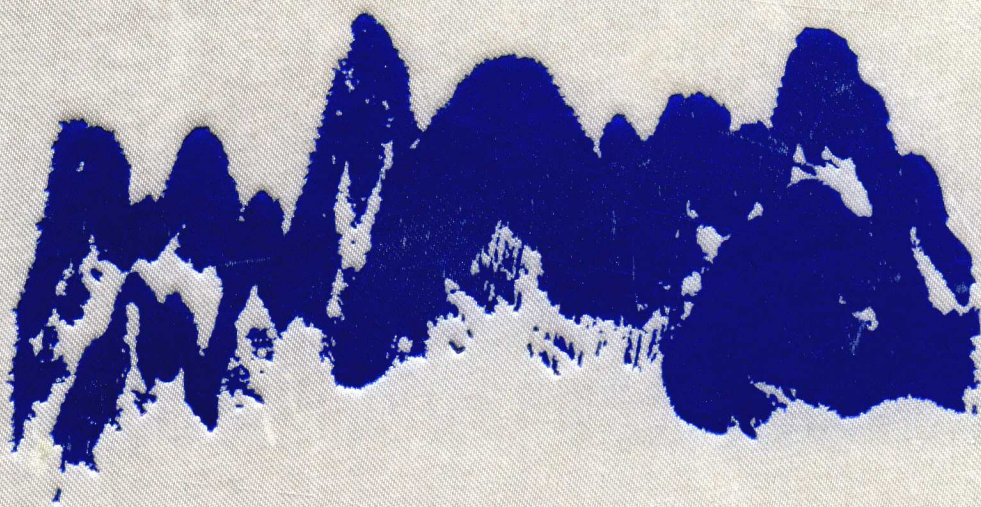


青城山道教

学术研究前沿问题
国际论坛文集

主编
盖建民

副主编
周治
朱展炎



回顾与展望

希泰题



青城山道教学术研究
前沿问题国际论坛文集

主编 盖建民
副主编 周治 朱展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顾与展望：青城山道教学术研究前沿问题国际论坛”文集/主编：
盖建民，副主编：周冶、朱展炎. —成都：巴蜀书社，2016.9

ISBN 978-7-5531-0725-7

I. ①回… II. ①盖…②周…③朱… III. ①道教—国际学术会议—
文集 IV. ①B95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3612 号

“回顾与展望：青城山道教学术研究前沿问题国际论坛”文集

主编 盖建民 副主编 周冶 朱展炎

责任编辑 王 雷
出 版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春晓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60mm×185mm
印 张 54.25
字 数 125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725-7
定 价 180.00 元

ISBN 978-7-5531-0725-7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发行科联系调换

目 录

关于道教研究的前沿问题(代序)——在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成立 35 周年

庆典上的主题演讲	陈耀庭(1)
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成立 35 周年致辞	罗中枢(15)
学贯中西 道通天下——祝贺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建所 35 周年	卓新平(17)
祝贺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成立 35 周年	黄心川(20)
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建所 35 周年致辞	袁志鸿(22)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贺信	(24)

区域道教的历史与传播

区域道教史研究方法简论——以西北道教为例	樊光春(27)
地方道教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王闯 杨立志(36)
东亚道教:道教研究的新领域	孙亦平(47)
地方志所见民国道教述论	寇凤凯(57)

全真道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全真教研究的回顾与前沿问题	张广保(81)
全真道宗派问题研究回顾与展望	赵卫东(98)
元代武当道士张守清法嗣弟子考	张全晓(132)

道教写经、碑刻与典籍

中古史上道教的写经	张泽洪 (149)
刊本道经与道书的“版本”问题	丁培仁 (161)
碑刻、科仪与区域道教研究——以云南为例	萧霁虹 (167)
《历代神仙通纪》初探	尹志华 (179)

道家与道教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论道教哲学	李刚 (195)
道教老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刘固盛 (245)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近百年道教重玄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黄海德 (252)
庄子“交一臂而失之”正解	张松辉 张景 (271)
金朝初中期道家道教思想史再考——以时雍《道德真经全解》为例	(日)山田俊 (276)
冥冥之中,独见晓焉:生态危机中的道教契机	陈霞 (292)

道教丹道新论

丹道实修琐谈——兼论大江西派丹法的特征	胡孚琛 (305)
从“反者道之动”谈逆成仙之道	林文钦 (321)
论内丹学工夫论中的“炼丹三要”	戈国龙 (339)
内丹史试论	(日)加藤千惠 (347)
Self-cultivation and Thunder Rites in the Teaching of Wang Wenqing	(以色列)Mozias Ilia (351)

道教医药与科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医道通仙道——道教医学研究的学术回顾与展望	盖建民 (381)
从中医原创思维的定性看道医学发展	张超中 (399)
内丹学与中医学的联系和区别	霍克功 (406)
《千金方》“天人合一”“治未病”伦理学思想研究	何则阴 (424)

道教心理与心性学研究

- 道学与心理学之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吕锡琛 陈明 (435)
- 坐忘与止观——道教心性学视野下的《坐忘论》再研究 郑开 (442)

道教文学新探

- 关于道教文学研究意义、地位与现状的几点思考 詹石窗 (463)
- 李白的道教信仰及其对山东道教文学的贡献 赵芑 (472)
- 浅议《三国演义》中左慈艺术形象的历史原型及文学塑造 赵彬 (483)

道教艺术与审美

- “道门文扶”:道教艺术作用论探究 潘显一 (497)
- 从早期道经看道教神仙的审美描述 苏宁 (508)
- 至道与至美:魏晋“清玄”书风与道教美学实践 沈路 (520)

道教神学与图像研究

- 前沿在线:道教神学、神系与图像的研究 李远国 (531)
- 道经图像的刻印探析 许宜兰 (546)
- 王重阳绘画作品考述 申喜萍 (556)
- 韩国朝鲜时代画屏《神仙图》考述 张明学 (569)

道释音乐研究

- 近三十年的道教音乐学研究 蒲亨强 (579)
- 重庆华岩寺佛教仪式音乐调查报告 陈芳 (591)

道教符箓与仪式研究

- 三十年来箓及授箓研究述评 刘仲宇(607)
- 缴箓研究:以南安市乐峰镇黄吉昌道长归真为例 谢聪辉(622)
- 道教尊师礼仪中的“礼三师” 孙瑞雪(645)

道教签占与法术研究

- 签占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林国平(657)
- An Intoning Immortal at the West Lake: Chen Wenshu and His Pursuits in Inner Alchemy
and Spirit-Writing in Late Qing Jiangnan (美)刘迅(676)
- 道、法的分工:四川法言坛的法脉及特点 (德)欧理源(708)
- 道教亥子日禁忌考 廖宇(728)

道教与地方社会

- “Healing Tao USA” and Popular American Daoism (加)Elijah Siegler (法)宗树人(737)
- 福建柘荣马仙信俗伦理规范的若干探讨 黄永锋 于笑夏(761)
- 灵济道派与福建地方社会 王福梅(773)
- 上海浦东传统乡村社区中的“家族道士”研究 龙飞俊(780)
- 云南宣威民间道派现状初探 申晓虎(794)

青城山道教养生文化及其他研究

- 道教养生研究三十年综述 杨玉辉(805)
- 道教养生文化产业化的几点思考 张钦(818)
- 陈撄宁与道教现代化问题的再探讨 刘延刚(822)
- 道教石刻雕像从仙真人神到民间民俗——以青城山天师洞的“嬉戏婴童”石雕为例 ... 张苏(836)
- 青城山宫观建筑艺术探析 李星丽(843)

在四川大学“青城山道教学术研究前沿问题国际论坛”上的总结发言 陈耀庭(853)

后 记 盖建民(858)

关于道教研究的前沿问题（代序）

——在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成立 35 周年庆典上的主题演讲

陈耀庭*

我，作为一个同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有 33 年友谊的老学者，向川大宗教学研究所成立 35 周年表示衷心的祝贺。

今天我在这里要讲的题目是现任所长盖建民教授向我提出来的，即我对中国道教研究前沿问题的思考。

这个题目，在去年年底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现任所长晏可佳教授就向我说过。今年上半年我在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也提出这个问题。最近，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的时候，他们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我明白，这个题目大概是目前中国学术界和世界范围的很多道教学者都关心的题目。

我来说这个题目，有点勉为其难。因为，我退休已经十多年了，离开科研第一线也已多年。对于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否正确，没有把握。说出来，只是供大家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作参考。昨天晚上，我粗粗看了全部论文。从论文的选题，我发现大家也关心这个题目，并且已经开始行动了。

道教研究的前沿问题，严格地说是一个情报类、信息类的题目。这个题目的研究应该以道教和道教研究的现状为依据，应该以道教发展自身的需要以及社会对道教的要求作为依据，应该以道教研究的学科建设的需要作为依据。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以这样三个依据作为前提，然后，提出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 作者简介：陈耀庭，1939 年生，上海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讲座教授，香港道教学院客座教授，上海城隍庙学术顾问，上海道教学院顾问，新加坡道教学院顾问。

因此，我首先要回顾一下中国道教研究的现状。

三十年研究的丰硕成果

近三十年的中国宗教研究，应该从改革开放开始时的 1979 年的昆明会议算起。昆明会议上集中了当时学术界、宗教界和政府部门的科研人员，一起研究中国宗教研究的规划。当时，“文化大革命”过去不久，“左”的思想还左右着部分人，所以，开展宗教研究工作是困难重重的。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南北学术界就“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一命题如何理解开始交锋，世人称其为“第三次鸦片战争”。

到了 1983 年在福州会议上，确定了由四川大学卿希泰教授领衔开始《中国道教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同时，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编撰会议上确定由罗竹风先生领衔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宗教卷》。于是，中国才开始有认真而客观的研究道教的工作。这一切距离今天已经有三十三至三十六年了。

我们开始研究道教的时候，只有四本书。那就是王明先生在 60 年代的著作《太平经合校》，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的中文译本《道教概说》，傅勤家先生的《中国道教史》，以及陈国符先生的《道藏源流考》。当时，我们看不到涵芬楼《道藏》。可是，现在，几乎每个图书馆、一些大的道观都有上海出版的《道藏》，还有四川出版的《藏外道书》、安徽出版的《三洞拾遗》和北京出版的《敦煌道藏》。现在开始研究道教的老师和同学根本不用担心缺乏基本的道教研究资料。现在几乎全国各省市都有道教协会的刊物，书店里几乎每个月都有道教研究著作或者道教书籍出版。虽然，比起佛教和基督教的刊物和书籍道教还是少一点。

三十年以前，我第一次参加有关道教研究的国际会议，就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道教仪轨和音乐”的国际研讨会。当时，内地只有五个人参加，四川大学的卿希泰教授，天津大学的陈国符教授，还有三个来自上海，包括我们院的秘书长、我和我的弟弟陈大灿，他当时是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全国在从事道教研究的至少有 200 人，包括道教内部的研究人员。四川大学道教和宗教文化研究所这些年培养的道教研究硕士和博士已经有几百人。我们在北京、上海、四川、云南、湖南、陕西、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吉林以及香港、新加坡等地，都能碰到从该研究所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因为有了足够的人才，中国道教研究学科的各个门类都已经有人把守。

正如朱越利教授曾经说过的，作为宗教学分支的道教学已经建设完善，道教学大致包括十八个门类：（1）道教思想；（2）道教史；（3）道教经典；（4）道教宫观；（5）道教斋醮；（6）道教法术；（7）道教伦理；（8）道教教育；（9）道教考古；（10）道教文学；（11）道教音乐；（12）道教美术；（13）道教建筑；（14）道教医学；（15）道教养生术；（16）道教和其他宗教；（17）道教传播；（18）当代道教。在每一个门类中，还可以细分为许多小类。

中国道教研究的各个学术领域都已经齐备，并且有人把守，各尽所能。这是我们在三十年以前根本不敢想象的。

其次，我要说一下中国道教的现状。

从中国道教这个宗教实体来说，我前年在香港一个讲座上说过，大约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道教实体的恢复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进入振兴阶段。二十多年的道教恢复过程，实质上是道教文化自觉的过程。如今，道教已经从文化自觉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那就是信仰自觉的阶段。

作为道教信仰自觉阶段的开始，希望大家重视今年召开的中国道教协会第九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九次理事会。

这届领导集体有四个特点：

一是文化程度较高。这次会议选举产生的一位会长和十九位副会长、秘书长，全部都是近三十年入道和培养出来的成年道长。其中近半数有大学或者大专学历，半数以上受过道教学院的教育，毕业于各道教学院。

二是年龄较轻。这次会议选举产生的会长和副会长、秘书长，绝大多数都是在 50 年龄段的成年人，有两位是 40 年龄段的。年龄最大的是嵩山的黄至杰 62 岁，最年轻的是西安八仙宫的胡诚林 42 岁。他们道风端正，精力充沛，办事成熟，社会活动能力也比较强，因此，由他们做带头人可以使道教组织发挥较大的作用。

三是进取心强。这次会议选举产生的会长和副会长、秘书长，据我所知，他们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弘扬道教文化，使道教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乃至在世界范围里发挥更大的作用。换句话说，他们对于中国道教的现状是不满意的，希望在自己任内让道教变得让人满意一点。

四是有了工作总纲领。这次会议的报道中说到，“《中国道教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五年来中国道教协会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道教工作目前存在的不足，总结了经验体会，对今后五年的工作进行了系统规划和部署”。“工作设想契合新时期道教事业健康发展的实际，是今后五年道教工作的总纲领”。请大家注意，九届理事会提出了道教工作的总纲领，这在历届理事会中是从未有过的。

会议结束的时候，新任会长李光富在会见媒体时说，“道教界将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加强自身建设，弘扬道教优秀文化，发挥道教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引领广大道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李会长说的这段话很全面，很稳妥，也很有志气。新班子的总纲领包括十项。这十项是：

一是继续开展好国际道教论坛和玄门讲经，打造道教优秀文化品牌项目。

二是充分发挥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的平台作用，选聘高素质人才，提高研究水平。

三是加强与学术界的合作，建立与专家学者、研究机构的联系合作机制，组织实施《中华续道藏》、《道医集成》、《道经精要》等文化工程项目。

四是用好道教学术研讨会、道教文化节、道教音乐汇演等平台，积极探寻道教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阐释古老智慧的现代价值。

五是加强教理教义新阐释工作，启动当代道教教义思想体系建构工程。

六是条件成熟时，成立中国道教文化基金。

七是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合作，发挥媒体的正面引导作用，充分展现道教的思想深度和文化魅力。

八是建设文化宫观、和谐宫观、生态宫观。指导推动各地宫观明确自身发展方向，负责人带头讲经弘道，使宫观真正成为传播道教优秀文化的窗口，弘扬优良道德的高地、净化信众心灵的道场、健康养生的乐园。

九是继续办好道教国际论坛，开展“道行天下”活动，成立世界道教联合会，跟着一带一路支持道教走出国门。

十是严格执行这次会议通过的四个教制文件和四个规章。加强道教教内的教务、教规、教制建设。

这样一个工作总纲领，是中国道教从1957年第一次代表会议以来从未有过的，值得大家重视，也是我们考虑道教研究前沿问题的重要依据。因为，我们都希望道教是生动、鲜活的，而不是博物馆里的道教。

第三，我要说一下，对于道教研究现状三十年的反思。

对于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反思

经过三十年奋斗的人，现在都已经老了，有的还永远离开了我们。新一代已经开始挑起了奋斗的重担。老一辈学人，对于已经做的都进行了反思，并且把这些反思留给了后人。

第一位是北京的牟钟鉴教授。他在《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道教卷》的《序言》中认为，从1979年的昆明会议以后，“宗教学理论和各类宗教及其文化的研究都在持续地蓬勃发展，其中尤以道教研究进速最快，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现在，海内外学界公认，中国内地已经成为世界道教研究的中心”。

对于道教研究今后的发展，牟钟鉴认为：“道教研究已经建立起雄厚的基础，今后还会向更深更广的方面发展，人们对于它的未来有许多期待。在资料收集整理方面，还要编《中华续道藏》，整理出版历代高道文集；同时广泛收集散落在民间的碑刻、铭文及地方史志资料，还有考古新资料，对这些资料作出科学的考辨、整理、注解、诠释。在道教史研究方面，全真道、正一道教派史和地区道教史的研究还有待于加强和扩展，以表现道教发展的多样性。在道教义理和方术的研究方面，要深入研究道教的教理，揭示其哲学的特色和结构，尤其对全真内丹学体系要有现代话语的准确表述；对道教的符咒文化要继续解密，作出理性的分析。在道教跨学科研究方面，要开展儒、佛、道三教关系史的研究，写出道学、禅

学、全真学关系史；同时继续拓宽道教文化研究领域，重点开展道教与民俗、道教与少数民族的研究。在道教的教理、教规的现代诠释与现代转型研究方面，学界与教界合作，共同探讨道教自身的更新发展及它与现代化的关系、道教的和谐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道教与其他文明的对话等问题，帮助道教更健康地发展。道教是重生的宗教，它的养生文化丰富发达，可以为构建东方生命科学和大众的健康作出重要的贡献，但尚有待于大力提炼和推广。”牟钟鉴教授对道教研究的各个部分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了全面的分析和预测。

牟钟鉴教授提出的有五个方面的分析和预测：（1）资料收集；（2）道教史研究；（3）道教义理和方术研究；（4）道教跨学科研究；（5）拓宽道教文化研究范围。这些分析和预测指出了道教研究目前存在的薄弱环节。做好这些研究是符合道教研究学科发展的实际的，提出的各种课题也都是必须进行的。^①

但是，如果说这些就是前沿，那么这些前沿似乎都是重要的，又都是不重要的。因为这些要做的事情面面俱到，却并未揭示所有这些未做而需要做的事情存在的共同理论根据，及其对于道教实体发展的决定性影响的关键所在。

第二位是上海的刘仲宇教授，他在执笔《中国宗教与宗教学》（“辉煌60年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丛书”之一）时写了第五章的《中国当代道教和道教研究》，其中有“站在新起点上的反思”一节。刘仲宇教授“反思”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目前对于道教的研究，还留有阶级分析方法以及唯心唯物两条路线斗争影响的残余。这类方法的残余不肃清，就不可能彻底清除“宗教鸦片论”的影响。

第二，目前将道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还不能揭示道教作为一种社会的有神论信仰的实质特征。

第三，目前对于道教的研究，比较多的还是从文献到文章，缺少以实际情况调查为内容的实证研究。

刘仲宇教授提出这样三个问题，应该说触及到目前道教研究的通病，并且为我们抓住道教研究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个思路。^②

第三位是北京大学王宗昱教授提出来的。他的文章《道教研究的若干问题》发表在2014年出版的《东方文化与养生》一书中。王宗昱教授认为最近几年内地道教的发展总趋势是“发现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新材料指的是田野调查和金石考古材料。新问题指的是道教和民间宗教的关系问题。新领域指的是道教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明清时期的道教。他认为，由于学术造诣不足和方法论的缺陷，这三个方面的深入研究还有很多困难，难以作出显著的成果。另外，王宗昱教授还提出了道教团体和学术界的关系的问题，即中国学者能否保证宗教学研究的客观性。他认为有些道教研究的学者已经丧失了客观立场，

① 参见牟钟鉴主编：《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道教卷》序，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② 参见晏可佳主编：《中国宗教与宗教学》（辉煌60年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丛书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6—88页。

变成了为政府服务的人和为道教捧场的人。^①

三位学者对于当前道教研究工作的反思，启发了我们对于道教研究前沿问题的思考。

下面，我说一下我对于道教研究前沿问题的几点思考。

我对道教研究前沿问题的思考

所谓道教研究的前沿问题，是指道教自身发展中当前存在的迫切需要从学术层面上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道教同政府和社会发生各种关系的种种问题。学术界有责任从学术层面对问题给予分析研究和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道教研究的前沿问题，不同于道教实体在目前发展中碰到的具体的实际问题，也不同于政府机构对道教实施管理时碰到的各种具体问题。

所谓道教研究的前沿问题，可能是当前或者未来的热点问题，但是，不一定就是社会各层次人都关心的热点问题。例如，每年春节，佛道教庙观和社会人士都关心烧头香，甚至出现网上拍卖烧头香的名额的热点问题。但是烧头香不是道教发展的前沿问题。

所谓道教研究的前沿问题，是指道教研究的十八个门类中，共同存在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影响到所有道教研究的方向和原则，影响到所有道教研究的理论和观点。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也能够推动道教研究更上一个层次，甚至会促进我们的研究工作打开新局面，出现一系列新观点和新结论。当然，其成果也会影响道教实体发展的大局。

根据我以上的理解，我认为，道教研究的前沿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恢复道教有神论信仰的本来面目的问题，另一个是正确处理道教信仰和中国民间信仰的关系的问题。

先说第一个前沿问题，恢复道教有神论信仰的本来面目的问题。

目前，从哲学角度研究道教哲学，只是作为一种哲学体系——道家哲学的延续，完全忽视了道教哲学是一种有神论哲学体系，是一种神哲学。

从文学和音乐等角度研究道教文学，只是将其作为中国文学和中国音乐的一种形式，忽视了道教文学和音乐是一种有神论的文学和音乐，是弘扬有神论思想的文学形式和音乐形式。

从养生角度研究道教养生，忽视了道教养生是一种有神论者的修炼方法，只是作为一种中国医药学、运动医学和心理卫生学的方法来研究和介绍，如同广播体操一样对待。

其他很多道教分支学科研究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这种情况的出现同中国道教研究人员的生存环境有关。他们生活在无神论作为指导思想的环境里，不这样研究就难以发表，就不能上课，研究人员就没有饭碗，因此，他们有意无

^① 参见王宗昱：《道教研究的若干问题》，载金勋主编：《东方文化与养生》，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25—37页。

意地淡化了研究对象的有神论思想的本质。而这个问题对于道教研究来说，那是影响道教发展和道教研究全局的大问题。

道教研究的前沿问题，首先应该用实事求是的观点，科学地研究道教有神论神学思想，为长久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道教，提出一个完整而有系统的道教有神论思想体系。

这次九届理事会的工作纲领中，提到了“加强教理教义新阐释工作，启动当代道教教义思想体系建构工程”。这条工作纲领比起过去来说，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至少道教界的领袖们认识到原有的教义思想已经不能符合当今社会的要求了，已经承认对教义思想要重新阐释。尽管这里还没有采用有神论教理教义的概念，但是，大家都知道新阐释就是要恢复教义教理的有神论内容。

这个道教神学思想体系，在信仰者的层面上，能够不受歧视地满足道教信徒的有神论思想和行为的要求；

在具有神职的宗教界的层面上，能够继承道教信仰遗产，发扬道教优良传统，使得道教在社会民众中，能够得到普遍的尊重；

在社会管理的层面上，能够让道教不断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发展和变化，使得道教自动发扬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作用，同时，能自动扬弃不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消极作用。

只有构建起这样一个完整而有系统的道教有神论神学思想体系，并且花大力气在当前神职教徒和骨干居士中大力弘扬，才能使得中国道教作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真正发挥在维护中国社会发展和稳定中的作用。同时，也能够把目前将道教作为一般文化现象的研究提升为对于传统信仰文化的研究，帮助道教界在三十年的道教文化自觉以后，提升到道教信仰自觉上来。

道教有神论思想的系统研究，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四个内容：

1. 对于道教有神论思想系统的构建和全面论述；
2. 对于道教有神论思想系统同世界其他主要宗教有神论思想系统的比较研究；
3. 对于道教主要经典《道德经》、《阴符经》和《度人经》等，以有神论思想重新给予注解和诠释；
4. 以新构建的道教神学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生活和当代人类困扰的问题作出新的解说，并且帮助当代道教徒解脱各种迷惑。

目前对于道教神学问题的认识有一些误区。

（1）原来一说道教的思想，教内的人说教理教义，教外的人说道教思想或者道教哲学。所有这些表述都和产生这些说法的历史和环境有关，不应该褒贬功过。但是，这些说法都没有说明道教的教义思想是有神论教义、有神论思想、有神论哲学。以至于有人用唯物论观点解释《道德经》，还被用作道教内部的权威解释和教材。如果，道教对于《道德经》的解释是用唯物论、无神论的观点来解释，那么，以《道德经》为基本经典的道教就不是真正的

道教了，也不是宗教了。

(2) 神学是西方宗教中教义思想的词汇。用神学这个词有抄袭西方宗教或者崇洋媚外的嫌疑。其实，如果将神学视作有神论思想的全部内容，那么，神学是世界上所有宗教共有的，其概念与哲学等处于同一层面之上。今天道教有许多学来的东西。历史上有道教协会吗？没有，辛亥革命以后，佛教学基督教，道教也跟着佛教学基督教，成立中华民国道教会。可是学人家又羞羞答答，不像佛教那样彻底，而是分宗派成立，北京成立一个，上海成立一个，结果两个道教会一直活动不起来，直到1957年才成立跨宗派的中国道教协会。历史上有《中国道教》杂志吗？也没有。历史上有“道教学院”吗？也没有。基督教早就都有了，佛教后来也学了，道教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学过来。我们老是说中国有汉代和唐代的盛世，汉唐文化盛世的标志之一就是开放，包容。学习其他宗教，发展和丰富道教，是不会有错的。问题是不能抄袭，照搬，把道教的核心信仰丢掉，那才是错误。现在，我们的语言学、文字学、语音学、语法学等等，在一百年以前都是没有的。那时候语言文字学问，叫“小学”，叫“音韵”，叫“说文”，叫“训诂”。整个语言学的一套东西都是向西方学来的。一百年前哲学也是没有的，只有“儒学”、“佛学”、“道学”、“理学”、“玄学”等等。哲学整个体系都是从西方搬过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别的学科能学，宗教的有神论神学就不能学？这不符合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律。问题的焦点是，在某些人的眼睛里，有神论思想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内容，因此谈不上“神”有什么“学”。

道教有神论思想教义思想的恢复和重新构建，这应该是道教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是关系道教全局和道教研究全局的大问题。

一些外国学者一直问我这样的问题：2014年春节晚会零点姚贝娜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歌名中这个人格化的有权柄的“天”是什么？当中国官方宣布清明节成为全民共同祭祖的国家法定假日的时候，不再区分你们的祖先是地主阶级还是贫下中农、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的时候，你们中国道教研究学者为什么不研究中国传统的“敬天祭祖”——这一在几千年的观念里包含着的深刻影响社会，并且成为中国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都接受的有神论思想的内容呢？我无言以对。

第二个道教研究的前沿问题，就是道教和中国民间信仰的关系问题。

目前，我们研究的道教基本上局限在宫观道教。如果道教内部也有精英文化和底层民众文化的区别的话，那么宫观道教应该是道教内部的精英文化部分。道教还有底层民众文化的部分，那就是散居于民众中间的散居道士，以及存在于民众生活中的大量民间信仰习俗。这一部分在现今的道教研究著作中都是避而不谈的。但是，接触过中国民众生活实践的人都知道，道教的生命力恰恰就存在于这些底层的民众文化之中。宫观可以被关闭，道士可以被赶出庙门，宫观经书可以被烧光。但是三十年恢复中，道士就是从民间回来，道袍、法器和经书，乃至神像都是由民众把收藏的送到庙观里来。底层民众中的道教和民间信仰习俗是道教的生命力所在，正因为有这些，中国道教会长久存在，中华文化的根系才不至于中断。

我的看法是要用实事求是的观点，对于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普遍的民间信仰现象作出客

观而科学的研究，正确处理民间信仰和道教、佛教、儒教之间的关系，正确界定民间信仰和邪教的区别，提出一个完整而有系统的民间信仰研究的理论体系。

这个民间信仰研究的理论体系，在信仰者的层面上，能够在按照传统进行民间信仰活动时不被斥责为进行非法的封建迷信活动；

在民间信仰活动的组织者的层面上，能够不被指认为进行非法的民间宗教活动，或者与邪教混为一谈；

在道教和佛教的宗教界人士的层面上，能够按照传统吸收中国民间信仰的某些神学思想、融合某些民间信仰活动和活动方式进入道教和佛教的庙观活动，而不被斥责为异端；

在社会管理的层面上，能够理直气壮地将民间信仰活动吸收为有组织的宗教活动，防止民间信仰活动的失控状态的出现，同时，也可以防止某些别有用心邪教组织利用民间信仰作为他们非法活动的掩护体，将无辜的信仰群众推向社会的对立面。

中国道教在历史上一方面和民间信仰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区别，同时，无可否认的是道教又以民间信仰作为它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活动形式的来源之一。切断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密切关系，无疑是切断中国道教作为传统文化的生命之源。

从本世纪起，国际道教研究学者都十分关心道教和中国民间信仰的关系问题。归结起来，他们的观点有以下三点：（1）目前中国学术界对于道教概念的界定是按照西方宗教学理论作出来的，不符合中国道教的实际；（2）中国学术界对于这样界定的道教研究是为中国现有政权对道教的控制服务的，因此，这样的研究不是科学研究而是为政府政策服务的研究；（3）道教和中国民间信仰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将道教和中国民间信仰割裂开来，等于限制了道教发展的动力和资源，对于保护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利的。

人们所说的中国民间信仰是个十分宽泛和模糊的概念。国际学术界很多人并不赞成使用日本学术界使用的“民俗宗教”、“民间信仰”这样的概念。但是，西方学术界至今也没有找到可以为大多数学者接受的概念。例如，本世纪初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宗教与中国社会国际研讨会”上，以及在世纪初出版的英文版道教工具书中，有人将人们一般指称的“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新定为“common religion”。这种 common religion 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非制度化的宗教，是与中国国家制度和社会组织相联系的“宗教”，是一种贵族和平民都信仰的宗教，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种 common religion 包含的内容大概就是：敬天、祭祀、祖先崇拜、万物崇拜、风水、占卜、求签等等，一切为整个中国社会共有的宗教现象。这种非制度化的宗教产生于制度化宗教之前，也就是在佛教、道教之前。而且，即使有了制度化的道教和佛教以后，几千年中，中国的非制度化的 common religion，仍然处于类似“国教”的地位，延续至今。

非制度化宗教，就是现在人们心目中的“民间信仰”和“民间习俗”。有人认为它们没有经典、没有组织、没有神职人员，因此够不上是宗教，一言以蔽之，统统都是“迷信”或者“封建迷信”。所以，研究这个问题，首先要对现在大家都在说的“中国民间信仰”，从概念上加以限定。不然，无法进行认真而符合实际的讨论。